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的办刊理念与经验

徐文梅¹⁾ 梁秋英²⁾

(1)《延安大学学报》编辑部,716000,陕西延安;2)陕西师范大学杂志社,710062,西安)

摘要 用文献资料法,剖析《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的创办背景、刊物内容和发展历史。认为: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树立了精品意识,立足本土,办出自己的特色,使该刊真正成为反映静生生物调查所科研成果的窗口;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依托于研究机构。

关键词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中国科技期刊史;办刊理念;精品意识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of publishing *Bulletin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XU Wenmei, LIANG Qiuying

Abstract An analysis based on documents is made, involving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nd history of *Bulletin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uccess of this journal main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factors, i. e. the notion of a brand journal and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which make the journal a real 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journal rel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

Key words *Bulletin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history of sci-tech periodicals in China; concepts of journal publishing; the notion of a brand journal

First-author's address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716000, Yanan, Shaanxi, China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办生物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创办的。该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尚志学会于1928年设立的,以“静生”命名是为纪念已故的“以提倡自然科学为职志”的范源廉(静生)先生^[1]。首任所长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兼任,1932年起由胡先骕继任。新中国成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重新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汇报》创刊于1929年,是该所主办的英文版学术刊物,附有中文提要,其英文名称为《*Bulletin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汇报》在初期为动物学与植物学合刊,自1934年第5卷起,植物学与动物学分别出版,但卷号连续不变,1940年各出版至第10卷。动物学的第10卷是终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报》被迫停刊。1943年7月1日《汇报》在江西泰和县杏岭村复刊出版,卷号重新起算,即新1卷1号,静生所复员后《汇报》又分别于1948年、1949年

出版了新1卷第2期和第3期。至此,出版了20年的《汇报》结束^[2-3]。新中国成立后,《汇报》就成为《植物分类学报》的前身之一。《汇报》之所以持续20年,而且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至1935年国外已有200多个研究所与静生所交换《汇报》^[4],这与它的办刊理念是分不开的,其办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科技学术期刊是研究机构的窗口——需树立精品意识

学术期刊是研究机构向外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媒介,科研成果通过期刊公诸于世,为科学界所了解,成为全世界共享的知识,静生所的领导人秉志、胡先骕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静生所在最初的计划中就提出“发行生物专刊以供国内外学者之参考”,自1929年开始出版《汇报》,为所内外研究人员提供了发表成果和开展学术讨论的平台。

胡先骕十分注重学术成果的质量,极力提倡树立精品意识,不轻易发表不成熟的成果,不盲目追求学术成果的数量,曾说:“甚愿吾国出版界,少发表未成熟之著作,以免开吾国学术界浅薄之风气。”^[5]为此,《汇报》建立了科学期刊界通行的评议人体制、编辑出版制度以为知识的相对可靠性提供制度保障。

根据静生所第1~10次年报所载论著目录统计,1928—1938年该所共在国内外近50种期刊上发表论著300多篇,其中发表在《汇报》上的有160篇左右,约占总数的53%^[1],说明它是静生所发表论著的主要媒介。例如:静生所第1任所长秉志在第1卷上就发表了他的3篇论文《厦门及其近处之动物》《安阳殷墟出土之龟甲》《哈尔滨螺类之新种》;静生所的第2任所长胡先骕把他的大部分论文也发在《汇报》上,如《中国东南部植物进一步观察》(1929)、《中国植物小志》(1929)、《中国之紫金龙属植物》(1930)、《中国安息香科新属:木瓜红属》(1932)、《中国紫草科之新属:车前紫草属》(1936)、《云南山毛榉科之记述》(1940)等;现代蕨类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开拓者秦仁昌,先后发表的以《中国蕨类植物研究》为题的论文11篇,在《汇报》第1~4卷上发了第2、3、4、5、9、10部分等6篇^[6];中国木材学的创始人唐耀的论文《穗果木科木材解剖之研究》《华南阔叶树材之鉴定》《中国裸子植物木材

之研究》等也发表在《汇报》上；我国真菌学的开拓者周宗瓚在《汇报》上也发表了《贵州菌类小志》《小五台黏菌志略》《华北之黏菌》等^[4]。

《汇报》遵照国际惯例，用英文发表，以便与国外机构交换。至1935年，静生所与200多家国内外机构交换《汇报》。《汇报》的广泛交换，对静生所起到了大力宣传的作用，使静生所声名远播，蜚声中外，《汇报》真正成为静生所的窗口，第一次实现了中国生物学与国际接轨^[7]。

2 科技学术期刊要办出特色——需立足本土

学术期刊影响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能否刊载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对于影响力与吸引力远不及世界名刊的中国科学期刊来说，国际影响力提升不可能依靠外国的研究工作，立足本土、自力更生，逐步从整体上提高国内的研究水平是最根本的途径。

中国近代名刊基本产生于地质学、生物学等这些当时受到优先发展的学科，这些学科正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外国人不可能对此有深刻研究，尤其生物学最初只是对动植物的分类研究，这更体现出地域特性。

《汇报》正是因为建立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才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认知，如《汇报》发表的《厦门及其近处之动物》《中国植物小志》《中国裸子植物木材之研究》《贵州菌类小志》《大熊猫之新研究》等。特别是1948年胡先骕、郑万钧合著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最具学术价值，正式向学界报道了水杉的新科、新种及发现经过，此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均有重要意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宣告“活化石”水杉的发现，震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是中国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2-3]。这些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的论文反映的都是对中国本土生物资源研究的成果。

3 科技学术期刊的生存需依托于研究机构——更需要经费作保障

静生所1928年创建于北平，即使在抗战初期，由于是美国退还庚款资助，请求美国保护，仍留在了北平，期间《汇报》持续出版，从未间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交恶，静生所被视为美国财产，日

军强行进入，静生所所有东西尽落日军手中，部分人员南迁江西泰和，继又西迁云南丽江，至此静生所的活动被迫中止，同时《汇报》也停刊。至1943年，由于江西泰和聚集了静生所的部分人员，《汇报》新1卷1号在这里出版。1946年抗战胜利后，在胡先骕的积极倡导下，静生所又在北平复员，但仅是植物部复员。静生所复员后，《汇报》于1948年又得以复刊，但也只是恢复了植物学。由于静生所终未恢复到战前的元气，经费异常拮据，所以，《汇报》复刊后仅出了3期^[4,8]。这足以说明研究机构是科技学术期刊赖以生存的基础。

静生所的经费皆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给，1928—1937年，它每年拨给静生所的经费分别是2万8000、3万、4万、5万4200、5万4200、6万6000、7万6000、9万、9万、9万5000国币元^[9]。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充裕的，其他生物学研究所不能与之相比。稳定的资助使静生所能够不断增聘人员，添购仪器设备和书籍，增强了静生所的研究实力，从而才有高质量的论著发表在期刊上，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由此可见，科技学术期刊没有研究机构做后盾，尤其是没有经费，是无法生存的。

4 参考文献

- [1] 姜玉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功的经验及启示[J]. 科学学杂志, 2005, 23(3): 330-336
- [2] 钱迎倩, 王亚辉.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生物学[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585-587
- [3] 吴家睿. 静生生物调查所记事[J]. 中国科技史料, 1989, 10(1): 26-36
- [4] 胡宗刚.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95-145
- [5] 胡先骕. 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J]. 东方杂志, 1925(9): 22
- [6] 谈家桢. 现代生物学家传[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1-85
- [7] 李辉芳. 留学生与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D]. 太原: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2006
- [8] 余德浚. 静生生物调查所[J]. 中国科技史杂志, 1981, 2(4): 84-85
- [9] 姜玉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学术建制研究[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 26(4): 291-311

(2008-12-15 收稿; 2009-01-11 修回)